

对冯王郑薛^①历史定位的再审视

□ 宋 刚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成都 610031)

摘要 本文对传统的将冯王郑薛划分为早期改良派的观点提出异议,在重新分析了冯王郑薛的思想与实践、并兼与洋务派典型代表人物李鸿章比较的基础上,得出“冯王郑薛与李鸿章都具有背离或突破洋务运动的思想现象,但却没有背离或突破洋务运动的实践实质,因而应当共同归属于洋务一派”的结论。

关键词 冯王郑薛;洋务派;早期改良派;历史定位

中图分类号 :K2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54X(2004)04-0072-03

自1860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展起来,代表人物主要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这些历史人物在整个洋务运动中扮演着先行者与领导者的角色,是洋务运动的发起人、倡导者与实践者,伴随洋务运动一起铭记史册。但是,在整个洋务运动中还有一批重要人物,他们因曾李左张等人的耀眼光芒而被掩藏在历史幕后,那就是冯桂芬、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他们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与洋务运动的宗旨保持一致,在整个洋务运动中扮演着洋务运动经理人与参谋者的角色,是推动洋务运动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许多学者将冯王郑薛从洋务派中划分出来,独立成为一个“早期改良派”。在仔细研读文献的过程中,笔者认为这种划分很有商榷的必要,在此笔者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问题的提出及参照对象的选择

目前学术界将冯王郑薛从洋务派中划分出来,独立为“早期改良派”的依据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对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要求”、“改良‘中体’的要求”以及“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的要求”。实际上,对于冯王郑薛到底应当属于洋务派还是应当独立为“早期改良派”,我们主要应从下面的角度来考虑:关键问题不在于他们是不是有背离或是突破洋务运动“自强求富”与“中体西用”的思想现象而在于他们有没有背离与突破洋务运动的实践实质。因此,一方面我们有必要从这个角度对以上划分依据重新进行考虑;另一方面,选择一位公认的洋务派代表人物作为参照来进行比较亦不失为明辨视听的有效途径。

如何选择参照对象,须根据历史事实而定。较之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自始至终参与和主持了洋务运动,他是实施“洋务”计划的关键人物,是洋务运动的灵魂^②。他直接创办了一系列洋务企业,并创立了新式海陆军以及新式海防要塞。蒋廷黻说:“中国最大的海军是他办的,最早的新式煤矿是他开的,最早筑的铁路是他筑的,最早接

的电线是他接的,招商局是他提倡的”^③。同光时期的近代军工民用企业和设施有45%是李鸿章主持下创办的^④。在整个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创办的大量近代工矿企业,使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在事实上支持、推动了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堪称是洋务运动自始至终的绝对领袖,可视为洋务运动的典型代表而作为参照对象。

二、冯王郑薛回归洋务派辨析——兼与洋务派典型代表人物李鸿章比较

下面将着重针对传统划分依据的三个方,并以李鸿章为参照对冯王郑薛到底属不属于洋务派这一问题进行辨析。

1. 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要求

冯王郑薛强调“商为国本”、“商握四民之纲”、“富民”与“富国”的根本在于兴商。在洋务派“借法以富强”口号下积极举办洋务事业的同时,郑观应更明确的树出了“商战”的旗帜:“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⑤。薛福成则提出“工商立国”的主张。这些言论表明冯王郑薛已经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不仅在于“船坚炮利”,更在于经济实力的差距悬殊上,主张在开矿冶铁、制器练兵的同时,在中国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

这明显是针对李鸿章等人“习兵战”与“官督商办”等“自强求富”道路而提出来的,因而也就被认为是区分洋务派与“早期改良派”的一个标准或依据。但冯王郑薛与李鸿章在这方面的分歧只是贯彻“自强求富”不同道路——“私营”与“公办”——选择上的差异,仍然是在贯彻“自强求富”与“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走的依然是洋务道路,不存在对“中体”的冲击,没有触及封建政治制度。况且李鸿章对发展民族工商业也是有一定认识的,他在奏折中曾指出:“泰西以商立国,商务之盛衰,即国势强弱所由判。凡有益商务者,必竭尽全力以图之”^⑥。将工商业盛衰提高到影响国势盛衰的高度。1872年李鸿章明确表示支持商人兴办轮船运输业:“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

船,又何必禁华商人自购轮船”⁷。李鸿章在积极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同时,“厘定章程,号召华商多设分厂,以资推广”⁸。明确号召华商积极参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这些都与冯王郑薛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观点是一致的。

从当时中国所处的境况分析,李鸿章与冯王郑薛同时认识到发展民族工商业的重要性并非偶然。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战火虽逐渐平息,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更加变本加厉,不仅掠夺廉价原料,还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的航运、铁路、电讯等方面,造成清朝财政日益枯竭,社会经济日益凋敝。在这种情况下,与西方“争利”必然成为当时社会先进人士的共识,而欲与西方“争利”,兴办民族工商业则当然为首选之途,因而才有了冯王郑薛“商为国本”与李鸿章“官督商办”。事实上,在中外民族冲突尖锐的时代,只要是中国人自己的企业就是民族资本,而不论其是封建国家开办还是私人开办,是地主阶级开办还是别的阶级开办。因而在发展民族工商业这一点上,实未见得冯王郑薛就是比李鸿章高明。

2. 改良“中体”的要求

在郑观应的著作中,有很多言论涉及改良“中体”。他曾指出:“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则放卷无具”⁹。明显表达了“道”、“器”统一的要求,也就是在采纳“西用”的同时,改良“中体”的要求。1884年他在日记中则有更为详尽的论述:“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蹉跎,难臻富强”¹⁰。更加明确的将中国陷入矛盾境地,无法富强的原因归结于对“西体”学习的缺失。这的确较之“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宗旨有所冲突,突破了“器物”学习的藩篱,涉及到“制度”学习的层面,提出中国要从经济到政治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明确要求。

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冯王郑薛在整个洋务运动中一直没有放弃鼓吹坚守“中体”的必要。薛福成1879年在《筹洋刍议》中阐述了“取西人器物之数,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的思想。郑观应19世纪80年代在《盛世危言》中也主张“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更需我们注意的是:1892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又说到:“中,体也,本也,所谓不易者,圣之经也。时中,用也,末也,所谓变易者,圣之权也”¹¹。在其提出全面学习西方“体用”后的第八年郑观应为什么却会再次回归“中体西末”的观点?一种合理的解释是,他的思想跟观点并不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的往复循环的过程,郑观应的思想在洋务运动宣告结束前两年(1892年)仍在“中体西用”与“体用一致”的矛盾中徘徊,他的思想是不成熟和不稳定的。他们所背负的传统文化的沉重包袱以及对西方认识的模糊,使得冯王郑薛无法最终彻底摆脱“中体”的约束与限制,真正走向“体用不二”、“体用同源”,而是更多的停留在“中体西用”的层面上,“改良中体”在其思想中只是昙花一现,“中体西用”才是真正的主流,因而仍与洋务运动保

持着事实上的一致。

随着时局的发展以及对西方认识的深化,这种“制度变革”的思想火花在李鸿章身上也有所体现。自80年代开始,李鸿章“变成法”的思想就不断向前发展,在政治上试图以儒家治平之道为主,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欲求驭外之术,惟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¹²。李鸿章主张把“修明前圣制度”与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强调“道器兼备”,而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改善封建政治制度。与60年代不同,此时李鸿章修正了所谓的“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榛莽之俗”的观点,开始认识到中国封建政治体制的某些弊端和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某些长处,将中国封建体制的弊端归结为:“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作为朝廷一品大员的李鸿章能够如此明确的提出“道器兼备”的观点,所需的见识与勇气应该说高于冯王郑薛,尽管其“道器兼备”之说也是稍纵即逝,未见实施。

3. 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的要求

冯王郑薛几乎都谈论过君主立宪制度,但是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只限于“介绍”的层次,出发点是以此作为比较来揭露封建专制政治的弊端,而没有与发展洋务企业或与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结合起来。这种狭窄的视野决定了其批判封建制度、推崇立宪力度与深度上的局限性。冯王郑薛都有广泛的西方游历经验,对西方认识较深,认为“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¹³。但是这种设立议院的思想仅仅将设立议院的作用局限于解决中国“言路不通”,冯王郑薛大多从“上下一心”的角度,探讨立宪强国的原因。这种认识在当时是具有普遍性的,冯桂芬的“君民不隔不如夷”、王韬的“上下之交不通”都是这样的认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不断的介绍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而他们本身并不能真正的理解君主立宪制度的要害与精髓。

而事实上,1864年春天,李鸿章就注意到日本的明治维新及君主立宪政体,思忖改革。他在给恭亲王奕訢的一封信中指出:“日本以区区小国,尚知及时改辙,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亦可以皇然变计”¹⁴。从70年代起,李鸿章开始揣摩中西政治制度的优劣得失,他曾对曾国藩说:“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日本益自其君主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日生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辍”¹⁵。80年代主张派大臣赴欧洲考究民政¹⁶,并逐步开始主张借鉴日本和西洋的所谓“善政”,改善君、臣、民三者的关系,以期实现“庙堂内外,议论人心”趋于统一¹⁷。

另外,关于李鸿章对君主立宪的态度,我们还可以从洋务运动结束后的一些史实来思考。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从政治舞台的中心退出,但1895年强学会在北京成立之时,他捐三千金请入会,次年《时务报》问世,鼓吹变法救亡,他捐银200元支持¹⁸。维新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出示清流弹章对李鸿章说:“有人谗尔为康党。”李鸿章答曰:“主张变法者即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并公开

对人说：“康有为吾不如也”^⑩。李鸿章思想中的立宪倾向一览无遗。对此，梁启超曾在他的名著《李鸿章》中如此概括性地评价了李鸿章的一生：“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前。”

除以上三个方面外，我们还可以从对立方的反应态度上考察冯王郑薛的历史角色。在整个洋务运动中，“开新”与“卫道”的斗争伴随始终，双方针锋相对，洋务派承受着众多的指责、贬低、辱骂与攻讦。方浚颐在《机器论》中指斥洋务派“以技艺夺造化，则干天之怒；以仕宦营商贾，则废民之业；以度支供鼓铸，则损国之用”^⑪。李鸿章被顽固派骂作是“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被指责“竭中国之国帑，民财而尽输洋人”^⑫，“僦之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⑬。权倾一时、位极人臣“入朝为宰相，在军为统帅，临民为总督，交邻为通商大臣”的李鸿章本人只是强调西用之学，尚且经常遭受到士大夫的无端攻击乃至朝廷的严厉训斥，甚至几度受到革职或闲置的处罚^⑭。但是，在考察冯王郑薛的进步思想时，我们却发现，他们不仅未因其思想上的进步而引起国人的重视与思考，而且也没有被罢官，没有被打击、压制——这就说明他们思想影响程度之小，甚至于没有引起他们的对立方（顽固派）的注意。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对政治变革压力要求的缺失、对洋务运动能促成中国富强与进步的幻想、封建道统思想的根深蒂固以及对西方认识的模糊与不全面决定了冯王郑薛理论上的不成熟，思想上的不稳定，使得他们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制度变革的理论讨论与舆论宣传，自己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与施政纲领，没有积极的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而仅仅流于清议。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以其思想对社会影响程度之小，不可能成为引领时代的主流思想，更不用说领导社会前进，不应将其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独立研究对象来研究，而应当将他们归属到洋务派当中。

三、结论

在洋务运动的开展过程中，在与西方频繁接触，承受近代工业带来的先进生产力冲击的情况下，在生产力展示其变革生产方式的巨大潜力时，无论李鸿章还是冯王郑薛在思想上产生一些进步色彩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些进步思想无疑是零碎的、不系统的、不成熟的，但却具有时代造就的共性，也正是这些时代共性决定了其无法得到稳固与付诸实践，不可能独立成为高扬于那个时代的思想旗帜，只能依附而无力突破“自强求富”“中体西用”的时代主题，终究只能在历史的车轮下化为齑粉。

刘平在《张之洞传》中曾引述了张之洞这样一段话：“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为国”与“为人”，“言势”与“言理”的矛盾可能就是冯王郑薛与李鸿章的共同矛盾与两难境地。“为国”则要“言势”，要求维护大清帝国的统治，因而强调“自强求富”，强调“中体西用”，“不越雷池一步”；“为人”则要“言理”，要求改革

中国积弱与封建专制，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以前我们片面的从“为人言理”的角度来分析冯王郑薛，看到其思想上的进步；同样片面的从“为国言势”的角度来审视李鸿章，强调其实践上的功绩，故而将两者区分开来。但如果我们将“为人言理”与“为国言势”结合起来对冯王郑薛与李鸿章进行全面考察，就会发现：他们思想上都具有超越洋务运动的进步色彩，但却都未以此作为其实践的主导，主导其实践的依然是“自强求富”“中体西用”的洋务宗旨，实践的依然是正统意义上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实践超越引发其思想上的共同超越，但其思想上的共同超越却未能反过来指导洋务运动实践的再次超越。因而，事实上，冯王郑薛与李鸿章是一致的：他们都具有背离或突破洋务运动的思想现象，但却没有背离或突破洋务运动的实践实质，因而应当共同归属于洋务一派。

注释：

①“冯王郑薛”是指按传统观点被划分为早期改良派的冯桂芬（1809—1874）、王韬（1828—1897）、郑观应（1841—1921）、薛福成（1839—1894）、马建忠（1844—1900）、容闳（1828—1912）、陈炯（？—1899）等人。

② 章育良《差异：曾国藩与李鸿章》（《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③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论集》，台北益世书局1970年版，第204—205页。

④⑭ 张富强《论李鸿章政治性格的基本特征》（《安徽史学》1996年第4期）。

⑤⑨⑩⑪⑬⑯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86、243、967、233、234—235、231页。

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4，转引自汤奇学《李鸿章的自强价值观念及其价值》（《安徽史学》1994年第1期）。

⑦《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转引自江秀平《李鸿章的心态与洋务运动的得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6期）。

⑧《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7，转引自江秀平《李鸿章的心态与洋务运动的得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6期）。

⑫ 李国杰等编《李文忠公遗集》卷5，光绪三十一年刊本，第13页。

⑬⑰ 转引自江秀平《李鸿章的心态与洋务运动的得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6期。

⑮⑯《洋务运动》第5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71—472、530页。

⑱ 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1页。

⑲ 蔡尔康译《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83—184页。

⑳《洋务运动》第1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7页。

㉑《洋务运动资料》第4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5页。

（责任编辑 张卫东）